

張政烺

論易叢書

張政烺 著

李 零 等 整理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 洛陽易經學會 編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 洛陽易經學會 編

張政烺論易叢稿

張政烺 著 李 零等 整理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政烺論易叢稿/張政烺著;李零等整理. - 北京:中華書局,2011.1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ISBN 978 - 7 - 101 - 07623 - 3

I. 張… II. ①張…②李… III. 周易 - 研究 IV. 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194704 號

-
- 書 名 張政烺論易叢稿
著 者 張政烺
整 理 者 李 零 等
叢 書 名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責任編輯 石 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規 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22 插頁 4 字數 300 千字
- 印 數 1 - 2000 冊
-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7623 - 3
- 定 價 56.00 元
-

叢書前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隨着各類考古資料的大量發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國考古領域逐漸產生了諸如農業考古、美術考古、冶金考古、環境考古、石窟寺考古、動植物考古和科技考古等分支學科，使中國考古學邁入了異彩紛呈的黃金時代。同時，石經、簡帛易學文獻及與易學相關文物的大量發現，極大地促進了易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因此，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這個重要課題，就提到了我們的議事日程。

一、《周易》哲學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唯一沒有被中斷的文明古國。考古學的發展，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大量嶄新的資料。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自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到十五世紀中葉的八千多年間，華夏文明的進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或前列地位。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哲學是塑造人類文化的理論基礎。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反杜林論·舊序》）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中華古代文明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創造出來的？有的說是儒家，有的說是道家。我們認為，這兩種

回答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雖然儒、道兩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都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儒家側重於社會人事,道家側重於自然天道。真正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決定性影響的,應是被稱為“大道之源”的《周易》哲學。

《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哲學經典,被譽為東方的“聖經”。《漢書·藝文志》說:“《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這就是說,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畫八卦”,開啓了《周易》哲學的先河。文王、周公“演周易”、撰《易經》,奠定了《周易》哲學的基礎。孔子及其弟子“作易傳”,構建了《周易》哲學的理論體系。自漢代以降,《周易》被儒家列為“群經之首”,被道家奉為“三玄之冠”。數千年來,《周易》哲學成為塑造中華文明的理論基礎,對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重要的是,《周易》哲學所體現的宇宙生成的“太極”學說、“陰陽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至今仍閃耀着熠熠光輝。因此,研究《周易》哲學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對於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易學考古的重大發現

易學是研究《周易》哲學及其對中華文明深刻影響的專門學科。漢代以來的易學研究,大都局限於傳世文獻,致使許多問題難以解決。自二十世紀以來,石經、簡帛易學文獻以及與易學相關的文物資料的大量發現,為易學研究開闢了新的廣闊領域。考古發現的這些文物資料,大體可分為四種類型:

1. 商周筮數易卦的重要發現

北宋末年以來,商周器物上常見有用三個或六個數字組成的

“特殊符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1978年，張政烺先生具體運用奇陽、陰偶的原則，把這些數字譯成《周易》的卦畫，遂使這個長達八百多年的“奇字”之謎，得到突破性的進展（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這些數字是我國古代筮占的產物，當名之為筮數易卦。它們的數量衆多、載體廣泛、內容豐富，或刻在甲骨、石版、陶片上以便事後驗證，或作為其載體器物的象徵，或在筮數前後繫以文辭，或兩卦並列以顯示變卦占法，或數卦並列表示排列順序，或是由四五個數字組成的互體卦等。這些易卦的發現和解讀，為研究八卦、《周易》的起源和形成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這應是二十世紀易學研究的重大收穫和突破。

2. 《周易》、《歸藏》的考古收穫

石經、簡帛《周易》、《歸藏》文獻的相繼問世，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收穫。這些發現主要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洛陽偃師東漢太學遺址出土的熹平石經《周易》殘石。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1977年，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周易》殘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出土、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戰國楚簡《周易》。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出土的秦簡《歸藏易》。這些石經、簡帛易學文獻的發現，是易學史上石破天驚的重大事件，為研究《周易》、《歸藏》的形成和內容諸問題，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可靠資料。

3. 先賢畫卦、演易的文物遺迹

自伏羲、文王、孔子以降，我國歷代先賢都把易學研究作為提高理論思維能力和探索“天人”關係的重要手段，故易學研究代不乏人、著述豐碩，成為中國古代學術最熱門的領域之一。因此，諸如舞陽賈湖遺址出土裝有石子的龜殼和古代式盤筮占器具以及淮陽太昊陵、天水伏羲廟、孟津龍馬負圖寺、洛寧洛出書處、湯陰羗里

城、洛陽周公廟、曲阜孔廟(孔府、孔林)、洛陽邵雍祠堂、二程故里等歷代先賢與畫卦、演易相關的文物古迹等,都應納入我們的研究範疇。

4. 體現易學思想各類文物

《周易》哲學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深刻影響,使許多文物遺迹和考古發現,都鮮明地打上了它的烙印。“陰陽對立統一”的辯證法則是《周易》哲學的基礎。《莊子·天運》載:“《易》以道陰陽。”《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易》以道化。”《易緯乾鑿度》謂:“故《易》者,天地之道也。”這說明《周易》是講天地、陰陽變化的著作。新石器時代和商周考古發現的璧、琮,漢唐時期的畫像石、墓室壁畫中常見的伏羲、女媧交尾圖,羲和抱日、常羲抱月圖和日、月圖等,都是陰陽觀念的反映。洛書“十五之數”與《周易》九、六之和相合。《易緯乾鑿度》說:“《易》一陰一陽合而十五之謂道。”偃師二里頭二號宮殿為八開間,岐山西周宗廟遺址面闊七間、進深八間,東周王城遺址東西七里、南北八里,漢魏洛陽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西漢長安城和隋唐洛陽城都是“經緯各長十五里”,北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和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綫皆為南北“十五里”,這些都是“陰陽和合”觀念在古代建築和都城制度中的具體反映。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是《周易》哲學的核心。《周易·繫辭傳下》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秦都咸陽城和隋唐洛陽城的“河漢”之象;西漢長安城“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文選·班固〈西都賦〉》);特別是明清北京城以自永定門到鐘樓南北十五里的中軸綫對稱展開,從城郭的形制、皇城的布局、五壇(天、地、日、月、社稷)的設置和城門的命名等,都顯示出天南地北、日月昇降、陰陽和合和法天則地的河洛八卦思想,這些應是中國古代以“天人合一”觀念指導都城建設

的典型傑作(蔡運章:《論河洛八卦對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影響》,見《大易集成》,齊魯書社,1994年)。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史記·秦始皇本紀》);漢魏隋唐墓室多呈“天爲穹窿,上設星宿,以象天漢銀河”,下爲方形,陳列隨葬器具“以象地上百物”,室內有死者置於棺槨之內;我國古代車輿“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周禮·冬官·輿人》),這些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觀念在中國古代文物制度中的深刻體現。

這些琳琅滿目的考古發現,內容豐富,時代連貫,地域廣泛,價值重大,不僅爲易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新資料,也極大地豐富了易學研究的領域和內容,理應引起文物考古和易學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三、易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聖經》考古是西方考古學的重要門類。因“對尋找《聖經》中書面事實具體證據的渴望,包括對大洪水留下的遺迹、諾亞方舟停靠的山脈和倒塌的傑里科之牆的尋找,刺激了19世紀整個中東地區考古事業的發展”。可以說西方考古學是從《聖經》考古開始的。比現存希伯來語《聖經》文本要早一千年的《死海古卷》的發現,使《聖經》考古“得到巨大的鼓舞”。目前,經過近二百年的不懈努力,《聖經》考古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英]梅芙·肯尼迪《考古的歷史》,希望出版社,2003年,第140-155頁)。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多年來,重大易學考古資料的相繼發現日益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關注,現已成爲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熱門課題。繼馬衡《漢石經集存》(科學出

版社,1957年)之後,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湖南出版社,1987年)、張立文《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新的易學考古成果陸續涌現,一批長期從事易學考古研究的學術隊伍也逐漸形成。因此,當前的易學研究,已經進入以歷史文獻、考古發現和古文字資料相結合的新時代,這為易學考古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易學考古就是通過對與易學相關的出土和傳世文物的全面搜集整理,採取傳世文獻、考古發現和古文字資料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對易學的起源、形成、發展、演變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新興學科。這些廣泛的研究內容,使它必然成為一門多學科相交叉的前沿學科。隨着這門學科的建立和深入發展,必將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為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作出新的貢獻。

古都洛陽是河圖洛書的發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鄉。為了總結多年來易學考古的研究成果,促進易學考古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洛陽市文物管理局和洛陽易經學會聘請著名學者李學勤、劉大鈞先生為學術顧問,邀請我國長期從事易學考古的李零、連劭名、劉正、韓自強等先生加盟編撰《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叢書,共同開展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研究。

長期以來易學研究多囿於傳世文獻的束縛,往往“見人不見物”,給人以虛無飄渺之感,很多問題糾纏不清。現代考古發現了大量的易學文獻以及與易學相關的文物資料,而考古工作者多限於“地層學”和“類型學”的圈子,往往“見物不見人”,很少把相關

文物放到《周易》哲學和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中去觀察研究，致使很多有價值的易學考古資料變成了“死古董”。我們這套叢書的最大特點，就是採取較科學的方法，全方位、多層次地對八卦、周易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對《周易》哲學的基本內涵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等問題，進行考古學的深入觀察和研究。全套叢書圖文並茂，儘可能吸收、反映易學考古的新資料和新見解。它既是對易學出土文獻及相關文物的系統整理，也是對前賢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既堅持嚴肅認真的學術性，又儘可能注意到可讀性。因此，我們力圖使這套叢書成爲易學考古的集大成之作。

我們相信，隨着易學考古重大課題的深入開展，《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叢書的編撰出版必將爲我國易學考古學科的建立和方興未艾的易學研究作出新的貢獻。然而，由於我們的經驗不足和學術水平所限，這套叢書中難免存在不足和錯誤之處，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郭引強 蔡運章 周建亞

2010年9月30日於古都洛陽

自述

張政烺

我所作的與古文字研究有關的第四類工作，是利用古文字資料研究《周易》。早在宋代重和元年（1118年）湖北孝感出土了六件西周初期銅器，其中一件稱《中方鼎》的在銘文末即有^木𠄎，因為學者不能識讀，故稱之為“奇字”。近幾百年公私收藏銅器中，也有這類帶“奇字”的銘文。至本世紀三十年代，郭沫若先生提出這種“奇字”是族徽的看法。1950年以後，在殷墟與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出土的卜骨上也發現了這類“奇字”。唐蘭先生對此提出了看法，認為這是“用數目當作字母來組成的”一種文字，並認為是氏族符號。而我則將這些“奇字”與《易》卦聯繫起來，其原因是因為我自1974年參加整理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周易》，常和一些研究《周易》的書接觸，對古代的筮術做了一些專門的研究。周初筮法現已很難弄清楚，但在一些後人寫的書中仍有記述，如王充《論衡·卜筮篇》、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朱熹《周易本義》後所附《筮儀》，這些文獻雖後出但也可能有較古的來源。有這些想法，便逐漸將上述銅器銘文末尾的“奇字”與《易》卦聯繫起來，並產生了一些初步看法。1977年，我見到了陝西岐山縣周原出土的卜龜。1978年12月，在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討論會上，聽徐錫臺同志講《周

原出土甲骨文字》，又提到周原甲骨中約七八片有“奇字”，有個銅甗也有這類“奇字”。聽衆中有人問我這種“奇字”是什麼字，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在第二天會末空閑時間作了《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講話，但是當時手頭無書，無從作深入闡述，只是初步提出了解決這些“奇字”的一些思路。認爲“奇字”即是《易》卦，銅器銘文中三個數字的是單卦（八卦），周原卜甲上六個數字的是重卦（六十四卦），並當場把周原卜甲上的數字變成陰陽爻，在黑板上寫出相應的別卦名稱。講完後，大家鼓掌通過。回京後，才進一步收集材料，把歷代著錄金文的書籍又徹底檢查一過，同時又看到考古發掘出土的許多新材料，遂加以考證，把初步結果寫成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下簡稱《試釋》）。因正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展覽，並舉行學術討論會，邀我參加，於是將此文提交作爲會議論文（後收入《考古學報》1980年4期）。在此文中我彙編了甲骨、金文中的《易》卦材料32條，指出當時還沒有陰爻（一）陽爻（一）的符號，而是用數位表示，奇數是陽爻，偶數是陰爻。文中即依此原則寫出了《周易》的卦名，指出32條材料中有168個數字，其中“六”字出現次數最多，其次是“一”字，但“二”、“三”、“四”皆是零次。推算“二”、“四”併入“六”，“三”併入“一”。這樣做估計是爲書寫時便於區分。占卦實際使用的是五個數字，記錄出來也只有五個數字，說明當時重視陰陽，具體數目並不重要。文中還對周初的筮法做了推測，並討論了卦變問題，探討了《周禮·春官·太卜》中所言“三易之法”之一的《連山》，認爲周原卜甲、張家坡卜骨以及一些金文中所見西周初之《易》卦，皆屬《連山》。繼此文後，我又寫了《殷墟甲骨文中所見的一種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輯）對殷墟卜辭中與傳世銅器銘文中所見到的四個數目字的卦的性質作了探討，認爲是易卦中的互體，四個爻當作一個卦。仍與上舉《試釋》一文所得結論相同的是，三

個四爻卦使用的數目仍是五、六、七、八，也無二、三、四，說明可能出於一個來源。後來我又根據新發現的西周甲骨和楚簡資料，發現卦畫中有“九”字，這是因為八卦創始於東方，“數以八紀，故所用數字止於八”。傳到西方，而“西方人數以九紀，九字遂進入筮數之中”，乃是一個民族化的問題（見《易辨——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載《中國哲學》第十四輯）。這種變化被《易經》繼承下來。

這幾篇論文皆主要是研究甲骨、金文中的《易》卦的，但為什麼青銅器銘文上會有卦？我則根據文獻，推測器銘有卦是因為周初作邑需占卦，因此用卦名稱呼新邑實屬可能。而且這種用數字組成的卦不僅是邑名，也已是氏名，即以邑為氏。這樣解釋，即對周初《易》卦研究中從史學角度提出的一個難題做了回答。這種看法按之古書，大抵相合。

摘自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原載張世林編《學林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85—305頁

寫在前面的話

——讀《張政烺論易叢稿》

李 零

2005年1月29日凌晨1點55分，張政烺先生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九十三歲。他的墓地選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那裏有很多名人作伴，王國維在其北，鄒衡在其南。每年清明，桃紅柳綠，我們會去祭掃。他的墓碑，就像他的為人，樸實無華，上面寫着他的人生信條：“真誠求實是為人為學之本。”

—

張先生是一位年輕的“老先生”。他的一生，可以清晰地劃分為四個階段：

(1)1936年，他從北京大學（下文簡稱“北大”）史學系畢業後，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文簡稱“史語所”）工作過十年，對史語所圖書館（今傅斯年圖書館）的建設和保護有大功。在他的回憶中，押解史語所的圖書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①。

(2)1946年，他從重慶回到他的母校，在北大史學系任教，當

^① 參看：張政烺《我在史語所的十年》，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846—850頁。

過十四年教授，為北大培養過許多優秀學生，然而北大卻是他的傷心之地^①。

(3)1960年，張先生被北大解聘，調到中華書局當編輯。當時，很多調到中華書局的老先生都屬於“有政治問題”的人。師母說，他很傷心。他賭氣說，他要到農村開照相館（因為編寫《中國歷史圖譜》，當時他在迷攝影）。1963年2月5日，張先生被任命為中華書局副總編，然而他卻從未到任，而是待在他長期兼職的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7年5月後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下文簡稱“歷史所”）^②。

(4)從1966年以來，他一直是歷史所的研究員^③。

張先生的研究領域主要是中國古代史。他上過北大，從馬衡、唐蘭學，深受清代金石學和羅王之學的影響；進過史語所，也繼承了史語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歷史語言的傳統；解放後，他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注重社會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較研究，眼界更為廣闊。在史學觀點上，他一直主張魏晉封建論，從未動搖。他特別重視古文字的研究。羅王之學的傳人，唐蘭先生那一輩是第一代，他和陳夢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胡先生也是史語所的老人。

遺體告別會那天，學術界的方方面面來了很多人。

骨灰安葬那天，臺灣方面，史語所的所長王汎森送來了花圈。

① 參看：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851—866頁。

② 從1954年參加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起，張先生就是該所的學術委員（從1950年起，他也一直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學術委員）。這裏的有關細節，各書記載不大清楚。為此，我請教過張永山、王世民、吳榮曾三位先生。這裏的年代是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人事處的同志查閱張政烺先生的人事檔案而定。又承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先生示，中華書局至今還保存着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商調函（1960年6月10日）。

③ 參看：張政烺《我與古文字學》。

回想當年，我讀研究生那陣兒，史語所的老前輩，很多人還在，夏鼐先生還在，尹達先生還在；羅王之學的傳人，中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除郭沫若、董作賓、陳夢家走了，別的老前輩，差不多都在①。

說實話，我有個錯覺，一直有個錯覺，這些先生始終都是“老先生”。當時我們只把這批先生叫“先生”，年紀輕一點兒的只叫“老師”。但這些“老先生”到底有多老呢？以今天的眼光看，好像也不怎麼老。比如，就拿張先生來說吧，他在紅樓整理組時，不過六十二三歲，和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帶我讀書時，也只有六十七八歲。

在我們稱爲“老先生”的古文字學家中，他要算是最年輕的了。

1979年，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最初的安排，我是跟唐蘭先生讀研究生，但唐先生突然去世，我才跟了張先生。這以後，秋風蕭索，大樹飄零。1983年，容庚先生走了；1984年，于省吾先生走了；1990年，柯昌濟先生走了；1991年，徐中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走了；1995年，胡厚宣先生走了。最後，就連張先生也撒手人寰，離我們而去。

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二

老師走後，留下一部研究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稿子，放在一個大紙盒裏。師母把它託付給我，要我負責整理。這部文稿，現在已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即紅色大開本的《馬王堆帛書〈周易〉

① 當時只有大師，沒有“大師熱”。現在相反，只有“大師熱”，沒有大師。

經傳校讀》一書。整理經過見我的整理說明，這裏不再重複。

現在出版的《張政烺論易叢稿》，是彙集張先生研究易學的所有文稿。

全書分上下兩編：

上編是先生生前已經發表的著作，一共有六篇文章，三篇和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有關，三篇與商周數字卦有關。

下編是先生生前未曾發表的遺稿，即上述《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一書的排印本。

最後，我們還在書後加了三個附錄：

附錄一是摘自中國古文字研究會首屆學術討論會（長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會議紀要（即《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討論會紀要》，《古文字研究》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8頁），這篇紀要記錄了張先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最初提出他對數字卦的想法。我認爲，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記錄。

附錄二是外國友人的紀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讓我轉交張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寫於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譯出來，收進張先生九十壽辰紀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張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給《古代中國》（*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號）寫的訃告，我也把它翻譯出來，收入此書。

吉德煒教授是美國最著名的甲骨學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國很有名的古文字學家，他們都對張先生的爲人和學問表示了由衷的欽佩，特別是張先生對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們視作張先生的最大學術成就。

附錄三是記上述紙盒內的其他材料，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個紙盒裏，對理解張先生的思路或許有幫助。

最後，我從張先生的自述《我與古文字學》中摘錄了一段話，是